

震后自救:政府企业如何配合

为解决资金缺口、融资困难问题,应遵循“生产自救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重建与振兴相结合、“输血”与“造血”、救助与淘汰相结合,针对企业受损情况不同,实施技术模式、引导模式、联合模式和改造模式等四种类型的救助模式。

■ 本报记者 赵雪

“现在仍处‘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企业最紧要的是查明损失情况,力保员工安全,尽最大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暂时停产的企业,应立即进行复产前的细致排查,尽快恢复生产。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开展赈灾行动,向灾区及时地运送救灾物资。”4月22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徐玖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5年前,汶川大地震后一个多月,徐玖平带领由学院教师组成的“智力援建”队伍,深入当地受灾企业进行调研。调研发现,90%以上民营企业没有制订对地震灾难的应急预案,导致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专门的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物资储备。



4月21日17时45分,从甘肃天水车站运送第一批救援四川芦山地震灾区的“抢7”次抗震救灾物资专列安全顺利运达成都铁路局的成昆铁路新津火车站。 CNS 供图

民企面临问题最大

徐玖平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完善的企业应急机制一方面能推动企业迅速开展生产自救,减轻政府救灾负担;另一方面,能为灾区提供亟须的电力、信息、金融以及救灾物资等方面的援助。

“企业灾难应急机制应从应急预案、应急决策、应急处置、应急保障四个方面构建。”徐玖平认为。

其中,完整的应急预案应体现何时做、谁来做、为谁做、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做;应急决策则是由企业应急管理领导机构负责灾难应急的统一指挥;应急处置系统负责对应急决策形成的指令进行具体实施;应急保障系统则负责应急处置过程中,包括应急队伍、救援设备、医疗物资等在内的各种资源保障的存储、调度、分配等。

资料显示,2012年,雅安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达57%,民营企业在资助贫困学生、扶贫开发、新农村建设和、架桥修路等慈善事业中投入资金600多万元,新增就业岗位2392个。

在雅安震后恢复重建和生产自救过程中,民营企业将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徐玖平向记者透露,在汶川地震中,四川受灾的民营企业经济损失约有2000亿元左右。其中遇到最集中的问题是恢复重建资金缺口大、融资困难、缺少相关援助政策。

“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显示:100%的受灾企业存在重建资金缺口大的难题,92%的受灾企业存在融资难题。”他表示。

汶川地震对部分民营企业造成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通过自救恢复生产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都非常缺乏。

据统计,震后3个月,汶川地震中72%以上的受灾企业自地震发生以来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虽有部分受灾企业通过生产自救恢复生产运营,但是由于重建资金短缺等难题,未能全面恢复重建。

据调查,30.3%受损企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借以交通不畅为由,停止向企业供货;50%的民营企业因为没有新的资金注入而难以恢复生产;30%左右的企业因为设备受损、技术故障而停产;5%左右的企业因为关键技术人员伤亡,大型生产设备找不到合适的人员进行操作而停产。

“民营企业的生产自救将影响着整个灾区的恢复重建,包括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物资、为灾后建筑重建提供原材料和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徐玖平解释。

不过,就此次雅安震后情况而言,他表示,与汶川地震相比,此次雅安震区企业受震要少一些,故地震对企业造成的损失较小。

四种救助模式

2005年8月,当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墨西哥湾时,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采取与公共机制接轨的开放式企业灾难管理,雇佣国际急救服务公司寻找灾民并清理尸体。

“美国的开放式灾难应急管理不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与政府、其他商业企业实现合作的过程,以便于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救灾。”徐玖平解释。

事实上,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的力量同样不能忽视。

由于地震使灾区民营企业发展的产业链断裂、产品市场被破坏,市场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震后民营企业往往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努力恢

复生产。政府的政策扶持对推动民营企业尽快实现生产自救效果起到重要作用。

徐玖平建议,为解决资金缺口、融资困难问题,应遵循“生产自救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重建与振兴相结合、“输血”与“造血”、救助与淘汰相结合,针对企业受损情况不同,实施技术模式、引导模式、联合模式和改造模式等四种类型的救助模式。

其中,技术模式一般针对比较轻微受灾企业,通过加大对受灾企业的技术投入,引进新技术、新理念给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引导模式主要针对损失较重企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借助于产业指导、社会帮扶和对口支援等方式对企业实施救助。

另外,还可以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联合模式使严重受损企业提升企业生产规模、办企水平,增强重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彻底毁损的企业,政府可以运用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优化地区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帮助企业实现转型、转产。

相关报道

大连泄洪:企业受灾谁来补偿

“洪峰来临,政府为了保障碧流水库安全度汛,保障大连市城区居民的饮用水源安全,开闸泄洪,作为受灾方,政府不能漠视企业损失。”有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 本报记者 闵云霄

雅安地震夺走了几百条鲜活的生命,让国人突然沉重起来。悲情的记忆再次会被人忙碌的生活渐渐冲淡,但反思却刚刚开始。面对突发的灾难,政府和企业的应对策略,亦是重要智慧。

去年8月,由于受“达维”强热带风暴潮的影响,辽宁省大连大雨倾盆,政府在危急情况之下,匆忙泄掉水库内的洪水,导致下游的普兰店地区遭遇罕见洪灾,6000多户房屋受淹,多家商铺、企业受灾严重。之后政府将之定性为“天灾”引发舆论质疑。

洪水冲刷古镇

城子坦镇是一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千年古镇,2012年8月遭遇了50年一遇的洪灾。

“2号下了一天的大雨,到8月3号凌晨雨才停,当时老城区积水面积约2平方公里,最深处可达5米。”4月12日,城子坦镇居民郝贵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回忆8个多月前的情景说。

洪水汹涌的进入城子坦镇,街道全部被大水淹没,超过一半的房屋已经变成了水房,公路被中断。

灾情发生后,城子坦镇政府向每个灾民发放825元生活补助。此后,居民多次到当地政府询问受灾补助款,当地政府随后改口说,此次洪灾是自然灾害,不在政府补偿范围之列。

今年年初,当地媒体称,政府打算

对城子坦镇淹没区进行整体搬迁。普兰店市发改局副局长吕祖文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证实,大连市政府从财政拨款专项资金3亿元用于居民搬迁安置,余下不足部分由普兰店市政府筹措解决,具体方案仍在设计中。

水灾发生后,普兰店市政府先后两次向受灾居民发放救灾款。“仅仅1000多元的救灾款根本无法弥补受灾的损失,现在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当地居民称。

8家企业“有意见”

与居民相比,当地的所有商铺和多家企业受灾非常严重,但至今却没有得到一点补偿。

有人认为此次洪灾的损失是因为排洪的不科学。《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获知,因为政府对河道管理投入的资金有限,设计的河道标准只是能承受住20年一遇的洪水,此次洪水是50年一遇,所以下游企业受灾严重。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该镇涌现了多家市属企业,仅2009年,规模企业总产值达到19.32亿元,财政收入达到4060万元。

3月24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时看到,街边商铺林立。经过洪灾洗礼后,也热闹非凡。经营建材生意的个体户郝贵峰,导致价值30余万元的建材被淹没。与郝贵峰隔街相望的建材店百米之外的大连茂丰制衣有限公司是此次洪灾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企业,据该公

司负责人王玉山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公司现有职工1300人,仅2011年,缴税近千万元。

“当时水深达2.4米,受淹厂房面积7000多平方米。部分成品、面料、辅料和设备进水,经普兰店市公证处到现场清点,直接财产损失达到2300多万元。”王玉山告诉记者说。

灾情发生后,8家企业所造成的损失均有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统计,8家企业负责人在此后多次找到城子坦镇政府,要求政府进行合理补偿。

城子坦镇政府在2012年8月9日给普兰店市经济和信局提供的《企业受灾情况报告》显示,洪水共造成当地8家企业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3155万元。

普兰店市经济和信局局长隋金萍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证实,接到城子坦镇政府给该局的《企业受灾情况报告》后,曾多次向市政府报告,请求政府给予受灾企业一定补偿,但至今没有回复。

洪灾应对被指不科学

碧流水库管理局副局长张春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常的情况下,碧流水库的泄洪量大约为600立方米每秒,由于2012年8月初,上游连续降雨,碧流水库泄洪河道出现了险情,当时洪峰以每秒5000立方米的速率从上

游通过大坝,上游来水量达到近50年来的最高值。在市领导指挥下,为保证碧流水库安全,水库的闸门全部打开泄洪,最高时达到每秒3700多立方米。“此次泄洪是水库投入使用后数量最大的一次,没办法,在这个时候,要尊重市政府的决定,分清轻重缓急。”

“作为大连市的水源地,大连市在极力保障水库安全的前提下,才超量泄洪,导致下游的城子坦镇受灾严重。”当地居民和企业主向记者表示。

碧流水库管理局水情调度处负责人牟宝权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称,“从8月2日开始泄洪,全部是上游泄洪流量大于我们泄洪的流量,充分考虑了尽量减少下游居民损失。”但在给记者提供的《碧流水库闸门启闭调度令》显示,8月4日入库流量是2450立方米每秒,而出库流量是3100立方米每秒。

大连市水务局河道管理处副处长李绪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除了水库超量泄洪外,下游河道的设计问题也是此次居民和企业受灾的主要原因,“因为河道设计施工时很多居民的搬迁问题,为了保护农民耕地,导致河道只能绕着居民耕地建设,导致大部分河道出现直线状,不利于泄洪,因为政府对河道管理投入的资金有限,我们设计的河道标准只是能承受住20年一遇的洪水,此次洪水是50年一遇,所以下游居民受灾严重。”

纵深

地震再拷公益组织公信力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四川雅安地震的发生,牵动着每一位爱心人士的心。各界积极行动起来,向灾区捐款捐物。

4月21日上午,东航集团向四川雅安灾区送上1000万元捐款,四川省委副书记柯惠平对东航第一家向灾区捐款表示感谢。

中华慈善总会宝马爱心基金第一时间启动紧急灾难救助机制,划拨200万元人民币救灾专用款,用于购买救灾帐篷、医药用品等灾区急需的物资,帮助缓解灾区的燃眉之急。BMW还向包括经销商、员工、车主等相关方发出倡议,号召宝马爱心大家庭全体成员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灾民共渡难关。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善基金齐红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地震发生后,基金会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消息,目前第一批志愿者已经在救援现场开展工作。“根据他们不断传出的消息,基金会正在筹集相应物资,第一批100顶帐篷已经发往灾区。还有很多在途的物资,1000个保温杯、1卡车饼干等。”

与以往捐助相比,齐红认为,“此次捐助公众更愿意捐助的是物资,物资相对比较多。”齐红笑着说,“希望在采购灾区急需物资的时候,商家不要发国难财。我们去买急需物资时已经不砍价了,有货就不错了。”

在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红十字会就其官方微博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引来的却是一片骂声。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当前最重要的是救灾,网络舆论暂“不去管它”。

而戏剧性的一幕也发生在深圳街头。有报道称,当地红十字会为地震筹款,市民绕行。这与近年来中国公益组织一系列丑闻和事件的曝光不无关系,公立慈善事业无论是在普通老百姓还是捐款者心中的公信力较前几年已经有所下滑。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此前表示,中国公立慈善机构的管理水平偏低,管理能力较弱,公信力、募款能力、治理和运营方面最近几年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引发公众质疑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据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机构回应公众质疑为何总不见报表和数据?捐款信息管理系统是否每个基金会都拥有?慈善组织公信力事件为何爆发越来越频繁?国家通过立法是否能彻底解决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化的问题?慈善组织是不是可以有商业系统,商业系统赚的钱怎么用?

“目前公众参与度非常高,但是都比较谨慎和理智。各界更愿意捐助的是物资而不是钱款。”齐红如是说。

“中国的慈善组织既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也没有市场的魅力,有的只是品格的魅力。”金锦萍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赢得公众的支持?就需要不断地向公众验证自己是一个良好的组织,也就需要专业机构的眼睛,帮公众来解读那些难以解读的事情。

记者手记

震区的另一种成本

地震发生后,“添乱”所带来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 张艳蕊

《中国企业报》记者亲历地震灾区,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在成都、雅安有序的组织。在欣喜的同时,也看到了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比如通往灾区的公路拥堵造成救灾物资不能运输进去,比如信息自媒体时代甄别假信息的成本和时间。

救灾是一个系统工程,从预案到实施再到施救,如果不能达到实际救援的目标,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一位工作人员在运送了1000顶帐篷、被堵一天后返回雅安后告诉记者,通往灾区的道路交通管理是最混乱的。不断出现余震山体滑坡是客观原因,但是,黄金72小时指挥中心没有充分评估灾区车辆的容积率,不断变换限行条件,对于进入车辆没有统一标准也是原因,结果出现了严重拥堵,很多社会车辆、记者采访车辆“添乱”的成分远大于帮忙。

志愿者的社会车辆怀着满腔热情涌入灾区,造成灾后受损公路严重拥堵,以致运送物资的车辆都被堵在路上而无法送达灾民手里,由此带来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从另一个角度反思,地震发生后,“添乱”所带来的成本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最乱的来自于各种自媒体信息传播的谣言,比如一条已查实是吸金电话的假寻人信息,曾被无数人煞有介事地转发。

面对残酷的自然灾害时,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不但增加了通讯系统的负担,更增加了受众筛选、核实的时间成本及其他成本,同时也把真实发布寻亲信息的水给“搅混”,由此所带来的信任成本又是何其大?

地震中,高科技企业也以试图帮忙做信息平台,然而,各自为战统筹缺位凸显。

从目前的情况看,科技企业的赈灾,正在各自用自己的商业价值和科技手段,科技企业界没有类似科技开放社区或者组织介入,各企业之间缺乏统筹和协同,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工作和效率低下。

一位记者感叹:信息不能共享,大家都在重复劳动,看着各大电视台,有些是直接转播央视,有些自己出动记者,各条战线自己出马,不堵才怪,不添乱才怪。

有专业人士建议,对于科技信息平台,最好是有公信力的组织,可以介入,政府可以通过整合各种科技手段建立科技开放组织,但需要将整合过程透明化,否则会重蹈红十字会信用缺失的覆辙。